

湖湘文庫

马宗霍 著 戴维 校点

南史校证

(二)

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 湖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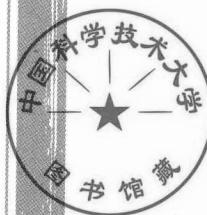
南史

马宗霍 著 戴维 校点

南史校证

(二)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史校证/马宗霍著.—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8.11

(湖湘文库)

ISBN 978-7-5355-5784-1

I. 南… II. 马… III. ①中国—古代史—南朝时代—纪
传体②南史—研究 IV.K239.1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9558 号



湖湘文庫 (甲編)

湖湘文庫编辑出版委员会

南史校证

著 者 马宗霍

责任编辑 符本清

特约编辑 戴维

装帧设计 郭天民

出版发行 湖南教育出版社

网 址 www.hneph.com

电子邮箱 postmaster@hneph.com

地 址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印 装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邵阳)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960mm×640 1/16

印 张 83.25

字 数 920000

书 号 ISBN978-7-5355-5784-1/G·5779

定 价 170.00 元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问 张春贤 周 强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耀
肖 捷 许云昭 戚和平 谢康生 文选德
孙载夫

组长 蒋建国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员 李凌沙 姜儒振 吴志宪 李友志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金则恭 朱有志 刘献华
钟志华 刘湘溶 彭国甫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李凌沙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员 唐成红 曾鹏飞 毛良才 刘国瑛
陈壮军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朱汉民 曾主陶 黄楚芳
委员 李建国 丁双平 汪 华 刘清华 黄一九
彭兆平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谢冠军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或据原本影印两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前　　言

马志谦

马宗霍（1897—1976），近代著名小学家、经学家、文学理论家、书法家、书法评论家、史学家。湖南衡阳市人。名骥，字承堃，号宗霍，以号行，世鲜有知其本名与字者。

马氏宗霍先生的先人明朝中叶由苏州迁到衡阳，世代以读书为业，却无达官显贵。其父声杰，诗赋丹青俱善，却无心仕途，不肯应举，流连幕客生涯。马氏三岁时，其父离家出走，一去杳如黄鹤。从此，祖母、母亲、九岁的长兄与马氏一家妇孺四口仅靠祖上留下的数亩薄田度日，祖母和母亲依靠纺织、刺绣以补家用，入不敷出，四季衣服常向当铺典赎，家境之窘迫可想而知。马氏自幼聪颖勤奋，六岁入县立小学，十二岁入衡清中学，皆能因成绩优异而豁免学费。在中学时，又考取了船山书院。船山书院因纪念明末宏儒王夫之（号船山）而得名，当时书院的山长为清季文学大师王闿运，书院教习方法与内容皆墨守陈规，一丝不苟，马氏因而得以兼受学校与书院新旧两种教育。马氏在学院年最少，才最高，极受王氏的赏识，王谓马氏“少年英才，可畏也”，称其赋“摹芳齐梁，又复有宋欧、苏之体……足见胸襟不凡，托体既高，识度自远”，称其诗颇有两汉、魏晋遗风，王氏如此之关怀与鼓励，对马氏尔后在文学上的成就影响至深。1910年夏，马氏兄长之友报考湖南南路师范学堂，笑邀马氏同往，马氏

因考试可免费供应包子，遂欣然应允，不料竟录取为第一名，其时马氏刚读完初二。该校系官办，毕业后就业无忧，且食宿学杂全部免费，还有免费校服一年两套。得此消息，举家欢喜。唯入学时要缴纳保证金六元，毕业方可退还，还要验交初中毕业文凭，这两件事，马氏实在无法办到。报到截止之日，马氏徘徊于校门口，学校总务处某科员见状，疑而问之，惊悉马氏乃其友之子，遂挺身相助，请学校在其月薪中分期代付马氏之保证金，且答应一年后补交中学文凭。马氏于是得以入学，文凭一事因辛亥革命遂无人追问。1915年马氏顺利毕业，留校任教国文。1918年，湘、鄂、豫、赣四省各选三名代表赴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参加教育部主办的注音字母研讨讲习班，马氏作为湖南南路的代表参加，这次研讨学习是马氏与文字学、音韵学以及文字改革运动结缘之始。曾在马氏母校任教的刘君，对马氏极为赏识，他1919年返乡出任江苏武进女子师范校长，立即函聘马氏前往，马氏认为江苏得风气之先，即使工资低一点也在所不辞，遂于中秋之夕到了武进，马氏在武进女子师范任教不一年便声名鹊起。次年，进入南京，自1920年至1927年，先后在南京金陵中学、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国立暨南学校、东南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教授中文。金陵女大是教会学校，行政全由美籍白人操纵，马氏发现校方一面侈谈平等博爱，一面却公然歧视华人，洋教授的休息室有火炉取暖，华人教授则无，马氏见状不胜其愤，后多次力争，终于取得同样的权利，然校方行政当局心怀鬼胎，一年后便提前解除原定三年的聘约，马氏以校方违约上诉到法院，校方终因心虚，提出付讫剩余年限薪金的条件而庭外和解。马氏经此一案遂彻底打消去美留学的念头，终其身，对崇洋媚外之人与事，无不深恶痛绝。

1927年，马氏应何鲁、马君武等之请赴上海，先后担任中国公学教授兼文学院长中文系主任和大夏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教授。1931年夏，出任中华民国考试院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襄试委员。1934年，马氏受其师章太炎之约，任苏州章氏国学讲习所特约讲师。1935年回南京任中华民国立法院秘书，负责《中国立法史料》的编辑，因时局动荡，旋即离任。在南京时，因拟编《孙文年谱》的需要，在章太炎的推荐下，与章的另两位高足（一位是柳诒徵，另一位可能是汪东）同被聘为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特约编审，此事因抗战而未有所成，但马并非国民党党员。1935年～1937年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南京被围前夕，马氏将家眷送至武汉，自己仍准备返南京，不料已无回去的船，只好一家都回衡阳，南京故宅之内，旅居沪宁二十年所集木版书籍二万馀册失于一旦。后学校迁重庆，马氏因老母在家，请辞。1939年，教育部在湖南安化（今涟源）成立国立师范学院以收留江浙逃难学生，教师多系江浙迁来，马氏长期在沪宁教书，又是湖南人，遂受聘为该校教授兼教务长一年，并任国文系主任八年。1946年～1949年兼任湖南省文献委员会委员，1947年兼湖南大学教授，1948年任湖南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大学教授，院系调整后，任湖南师范学院教授，直至1959年。在此期间，还兼湖南省人民政府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省人大代表，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

1958年秋，马氏离长沙赴京治病，与夫人舒士彦一起应中国科学院之请参加哲学所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的古文今译工作，马、舒二人负责《庄子》《韩非子》等部分。1960年，马氏受聘中央文史馆馆员，并任文化部委托中华书局成立的古籍

4

小组特约编审，担任过廿四史的总编审一段时期，完成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标点本总编审，还参与标点了《清史稿》。马氏还应邀至中央高级党校、科学院历史所、北京大学古典文献班、东北文学研究所等讲授先秦典籍。在此期间，有关方面曾有意出版章太炎的政论文集，请马氏主其事，整理、编辑、标点工作已竟，书名已定，清样已出，忽获禁止发行之令，遂使该书胎死腹中。1965年，马氏正着手整理《十三经》时，文化大革命爆发，工作终止。马氏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1969年得老友章士钊、杨东莼、周世钊之助，正式归编中央文史研究馆，免于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但工资少了许多，贫而多病，1976年9月19日因脑溢血病逝于北京。

马氏的学术活动始于1920年，在1920年～1937年间，结识了不少学术界的知名人士。二十年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其处女作《太平洋之今昔观》，极有见地地预测到太平洋地区将成为未来的经济发达之所在。1922年，与友人吴宓、梅光迪、胡先骕一起创办《学衡》，马氏在《学衡》上发表《国学摭谭》系列长文，反对白话文。据马氏晚年回忆，《学衡》初办时并无组织，参加者亦无正式名义与分工，某日，吴宓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自称总编，马氏与梅、胡当时皆年轻气盛，遂皆负气而散伙，吴宓也就真正成为了总编。《国学摭谭》因此中断，以不了了之。1924年，马氏在某报发表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演讲录。只因他在1925年以前名承堃，1925年以后名宗霍，以上文章皆以承堃为名发表，故已无人知晓了。抗战期间，在国立师范学院创办《卮言》，发表了《读全唐文日劄》等多篇文章，现亦难以收集了。马氏一生，还有两件大事，其一是拜章太炎为师。1925年，二十八岁时，马氏任正式教授，随后，第一部著作《文

学概论》出版。章太炎先生来南京，校方派马氏负责接待，与这位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朝夕相处数日，交谈之下，章氏对马的才学极为欣喜，遂主动提出接纳马氏为其关门弟子，马氏大喜过望，当即用红笺书写下门生帖，带一只火腿以为束修，登门入室，行跪拜之礼，成了章的弟子。后来章氏国学讲习所的学生，虽然也算章的学生，不过他们与章的关系应该是现代的师生关系，不得称为弟子了。据马氏自叙，章是令马氏相信自己能在经学和小学领域大有作为者。马氏云：“三十以后，专治朴学，不暇旁骛者，章之教也。”自从得了章氏这块金字招牌，马氏于人才济济的南京、上海脱颖而出，由此可见，章氏对马氏的影响不仅在于事业的取舍，而且落实到事业的实践。马氏另一件大事是拜曾熙为师。曾是清末民初的书画大师，也是湖南衡阳人，曾任湖南学政兼南路师范校长，他当时在长沙主政，校长只是挂名，故马氏读书时并不认识他。马氏毕业后，第一位夫人是曾氏的本家族妹，故马到上海时始去认这远亲，这时曾在上海卖字画为生。通过曾的关系，马氏得以结识另一位大书法家李瑞清。马氏还与大诗人陈三立、其子陈衡恪、清末翰林夏午诒等结忘年交，并与同为曾、李弟子的张大千结下颇深友谊，张为马氏作画尤多，惜经南京一劫，所剩无几。马在拜曾为师以后，得以窥见曾熙、李瑞清、谭延闿等人的收藏，眼界大开，遂于篆隶真行诸体无所不善，既能作三尺见方的大字，亦能作芝麻大的小楷。解放前为人所写碑、匾、楹联、条幅极多，其信札与手稿亦颇被人收作珍藏，解放后忙于写书，很少写大字了，但出版的书全部是手稿影印，这在当时也是少有的荣誉。马氏的书法，结构严谨而笔势飞舞，波磔横生而潇洒自如，如风吹仙袂，超尘逸俗。

马氏在史学领域用功极深，对历代典章制度尤为谙悉，其史

学修养在《说文解字引经考》《中国经学史》中都有充分的显示，《中国经学史》就是一部学术史，但马氏直到晚年才专注于历史，在七十七岁高龄完成了他的史学专著《南史校证》。该书费时近七年，全书约六十五万字，旨在对唐人李延寿的《南史》作一详细的校证。章太炎在《国学略说·史学·编年史》中说：“南北朝史，均病夸大，至李延寿作南、北《史》，稍为减杀，是故整理南北朝史，殊非易事。”不知章氏和马氏平时是否聊过这个观点，不管怎么说，马氏这回终于做了这件事，为中国历史学尽了一份力量。南、北《史》并出自李延寿，宋祁称其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司马光亦称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一句话，就是比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周的正史简单明了得多。至于清朝《四库全书·总目·南史提要》则称《南史》减字节句每失本意，间有所增益，又缘饰为多，采杂史为实录，未可尽信。扬《北史》而抑《南史》，跟宋祁、司马光唱反调，令后世读者莫知所从。马氏认为宋祁、司马光既是总评李延寿之书，《南史》也应在其中，故作《南史校证》，看看《南史》是否和《北史》相匹配，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述是否有偏见。《南史校证》全书分为八十卷，一依《南史》之旧，卷内有纪有传，逐篇校之，每篇之中，逐文校之，共得八千四百餘条，比之清朝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中有关《南史》二百二十条，《诸史拾遗》中有关《南史》三条，洪颐煊《诸史考异》中有关《南史》一百零九条，张燧《读史举正》中有关《南史》七十条，李慈铭《南史札记》九十五条，赵翼《廿二史劄记》中有关《南史》二十九条，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南史》合宋、齐、梁、陈《书》共三百三十九条而言，过之远矣，盖因诸家非全校，而本书是全校也。本书在校证中，参考的书籍主要有《宋》《齐》《梁》《陈》

《晋》《隋》《后魏》《北齐》《周》诸书；李延寿所旁征博掘，亦即《南史提要》所谓采杂史为实录者，多见于《太平御览》，其所引书籍（今多亡佚），共计十五种之多，这次当然也是重要参考：《御览》所引丘悦的《三国典略》与《南史》时间相接，内容与之相同者甚多，均可佐证《南史》；《资治通鉴》对《南史》有取有舍，斟酌有度，尤为校《南史》之重要书籍；《册府元龟》为宋代四大部书之一，义例较严，所采多主正史，每条不注明所出，不便引据，然所见诸史皆北宋以前古本，可以校史，亦可以补史，故也是一本极好的参考书。兹举三例以示本书校证之严：其一，卷一《少帝纪》末，“始徐羡之、傅亮将废帝”。马氏按：“《南史》此下所述多本之《宋书·徐羡之传》，宋蜀刊大字本《宋书·少帝纪》末有缺页，明弘治修版又取《南史》此段补之，一字不易……又按宋蜀本《宋书·少帝纪》末缺页前一页皇太后废少帝令末行‘今废为荥阳王，一依汉昌邑晋海西故事’二语下有一‘镇’字，审其语气，令文未完，‘镇’字当在令文之内，因疑前条引《册府元龟》所载太后令即为此令之后半，原文盖为镇西将军宜都王云云，合之前半，文义正相衔接，《册府》辑于宋真宗时，其时，《宋书·少帝纪》全卷未缺，故王钦若辈得节取之也。张元济《宋蜀本宋书跋》于本纪太后令文末‘镇’字下缺文亦见及此，然谓‘必为镇西将军某某入纂皇统云云，惜已亡逸，无可征信’，盖未检《册府元龟》，犹不知镇下缺文之尚有可寻耳。”其二，卷三十三《郑鲜之传》，“元嘉三年，弘人为相，举鲜之为尚书右仆射”。马氏按：“《通鉴》一百二十：‘元嘉三年二月戊午，以建安太守郑鲜之为右仆射’，盖即王弘之所举也。但《宋书》、《南史》上文皆云‘鲜之出为豫章太守’，不云‘建安’，与《通鉴》异。寻《宋书·文帝本纪》云‘元嘉三年二月戊午，以豫章太守郑鲜

之为尚书右仆射’，与本传正合，下又云‘建安太守潘城有罪，伏诛’。然则《通鉴》此条，实本之《宋纪》，而以潘城之官误移之于鲜之之上耳。自来校《通鉴》者未尝及此，是不可以不订。”其三，卷四十九《庾杲之传》，“清贫自业，食唯有葷菹、瀟葷、生葷杂菜，任昉尝戏之曰：谁谓庾郎贫，食鲑尝有二十七种”。马氏按：“‘任昉尝戏之’《南齐书》本传作‘或戏之’，‘鲑’下‘尝’字《齐书》作‘常’，是。又‘二十七种’下《齐书》有‘言三九也’四字，九音同葷，三九即上文葷菹、瀟葷、生葷也，《南史》删去此句，则二十七种不知何所谓矣。”例一借《册府元龟》有关条文证实了《宋书》的缺文；例二以《宋书》证明了《南史》的正确，同时又订正了《通鉴》的错误；例三以《齐书》说明《南史》本文删节不当之处。由此可见，马氏校证《南史》是竭尽全力的，研究南、北朝的读者，甚至研究晋、隋的读者，不可不阅本书，《资治通鉴》更是广为流行，其关《南史》部分，少量错误犹在，亦赖本书之校。《湖湘文库》选择了马氏这部未曾面世的作品，也是基于对原稿学术价值的考虑。

马氏一生著作甚多，从1925年起，直到1974年止，解放前发表的为六种：《文学概论》，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多次重印，而且在港、台不断翻印；它坚持从中国文学实际出发，构建了一个完整而与众不同的文学理论体系，既不照搬西方，也不因袭传统，故马氏此书极富鲜明的民族特色。《音韵学通论》，1929年完成，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两次再版，书前有四封章太炎讨论音韵问题的信札；这是以音韵学专家为读者的专著，各篇之中，均不乏马氏独到的见解，且引诗而证音韵，实属独创，为音韵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文字学发凡》，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37年再版，台湾鼎文书局1979年翻印；本书

对文字的来源与构造，六书的形成与使用，均有前人未及的独到之见，内容涵盖周全，分析细密。《中国经学史》，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它是商务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一册，多次再版和翻印，是经学史领域经久不衰的名作，该书卓然独立于古、今文学派别之外，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两派的学说和源流，独自创见亦不少。《书林藻鉴》，《书林纪事》，两书皆由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出版，1984年由文物出版社合并影印发行；该书收集资料丰富，尤其是各卷前的十二篇序论，依其时代特点，或考证字体起源，或叙述流派衍变，或分析艺术价值，无不妙论横生，慧眼独具。解放后，《说文解字引经考》《说文解字引通人说考》《说文解字引群书考》《说文解字引方言考》于1958、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根据手稿影印发行；上述四种书实为马氏集二十年精力对许慎《说文解字》所作的全面深入的研究，问世不久，台湾就将其翻印，令其在海外学术界流传。杨树达先生在序言中说：“余发卷读之，则胜义纷起，累累如贯珠，皆自吐心得，不肯作一依傍他人语……君独到之见，清儒所不及。”马氏生前出版的书至此而止。齐鲁书社1984年出版了马氏的遗著《淮南旧注参正》《墨子间诂参正》。这两部书征引博洽，考证周密，许多前人误读、误解或因不得其解而擅改原文之处，马氏均能博引群书和引申字义而合理解决。又有《论衡校读笺识》，三十年代作于上海，适逢黄晖《论衡校释》面世，稍后，刘盼遂《论衡集解》出版，于是凡与黄氏所采诸校记相同者，并从刊落，遇黄、刘有失读失解之处，间复纠订，重加料简，黄书既出，不欲再注，将剩馀之一千一百八十馀则付之单行，亦治《论衡》者之所资与。此书定稿于1959年，拟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外，尚有《经学通论》《清史稿点勘札记》正在整理中。

南史校证略例

南、北《史》并出李廷寿，据其自为序传及新、旧《唐书》延寿本传所载，其书盖就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周、隋八代正史重为编缀，刊烦补阙，自成一家之学。宋子京称其删落醣辞，过本书远甚；司马君实亦称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盖皆就二史统言之。至于专评《南史》者，则清《四库全书总目南史提要》谓延寿当日专致力于《北史》，《南史》不过因其旧文，排纂删润，故其减字节句，每失本意，间有所增益，又缘饰为多，采杂史为实录，未可尽信。斯则扬《北》而抑《南》。然其所谓减节删润者何若，缘饰增益者何在，非就宋、齐、梁、陈本书对讎，未由知之，而子京、君实所赞为过本书，胜正史者，既系李书总评，《南史》当亦不能屏外，余因本是旨而作《南史校证》。

《南史》本证固当取资于宋、齐、梁、陈四史矣，然刘宋初期，事多涉晋，梁、陈末造，事兼逮隋，则《晋》、《隋》二书亦校《南史》者所必考，至于南北分疆，犬牙交错，或和或战，进退靡恒，其间人事迁流，彼此互载，故有一事分见，一人两传，可征之于后魏、北齐、周书者，又《南史》旁证之资也。

《资治通鉴》纪述南朝之事，兼采宋、齐、梁、陈本书与《南史》，而以采本书为主。其采《南史》，有作为正文者，有入之

《考异》者。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引朱文公谓南、北《史》凡《通鉴》所不取者皆小说也，其语颇为审谛，后人或谓《通鉴》偏重《南史》者非也。由于《通鉴》对《南史》有取有舍，则取舍之间，斟酌自有权度，故《通鉴》一书，尤校《南史》者所不可忽。

《南史提要》又谓自《宋略》、《齐春秋》、《梁典》诸书尽亡，其备宋、齐、梁、陈四史之参校者，独赖此书之存，据此，则知四史固为校《南史》之本，而在校《南史》之同时，亦可藉《南史》以兼校四史，互相校因互相订，互校互订，交受其益。故余于《南史》与四史有异同处，字句之间无关宏旨者，则存而不论，至若涉及史实者，虽小小出入，亦必反复推寻而证定其得失，其或两俱难定，则折衷于《通鉴》，亦偶有因推寻之密而发见《通鉴》之误者，凡若此等，皆特为识出，系于各卷当条之下。

《宋略》为裴子野作，《齐春秋》为吴均作，《梁典》为刘璠作，其书虽亡，今并见于《太平御览》所引。三书而外，见《御览》者，尚有徐爰《宋书》、孙严《宋书》、王智深《宋纪》、王玉《宋春秋》、谢绰《宋拾遗》、《宋元嘉起居注》、《宋百官春秋》、《宋先朝故事》、《宋议书》、沈约《齐纪》、《齐职仪》、何之元《梁典》、萧韶《太清纪》、姚勗《梁后略》等。凡此诸书，虽非正史，《御览》所载，虽残而不全，然余校《南史》时，遇有增益于宋、齐、梁、陈本书者，往往于《御览》所载上述诸书中得之，是则诸书者，盖即延寿之所旁征博据，亦即《南史提要》所谓采杂史为实录者也。《御览》又引《三国典略》，其书为丘悦作，以关中、邺都、江左为三国，起西魏，终后周，而东包魏与北齐，南总梁、陈，寻《南史》增益之文同于《典略》者颇多，丘悦唐初人，与延寿时相接，彼此似不得剽袭，或者两书资料有同出一源者，亦